

鲁迅传统与藏族作家阿来的创作

丁 颖,邵洋洋

(大连民族学院 文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大连民族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以“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确立其文坛上不可规避的界碑地位,也以“精神资源”主体的思想力量同构着中国精神领域的纷纭格局,并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作家的文化思考和精神探求。藏族作家阿来,不仅剥离出西方文化及藏地民间资源、宗教传说等方面的艺术滋养,还与汉族文化的代表鲁迅之间发生着精神缠绕,这便于廓清其创作方面的深刻性和先锋性,也是对民族融合、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作家创作基本规律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鲁迅;阿来;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6-0061-0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作家能象鲁迅那样持续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坛及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他在文化批判和历史思考方面体现出巨大的丰富性,在文学表现和艺术想象方面呈现出巨大的先锋性,在人文关怀和社会救赎方面昭示出巨大的超越性。“回到鲁迅去”不仅是一种研究角度、研究范式的开辟,更是与鲁迅传统的“遭遇”和“对话”。鲁迅精神的当代回响是一个精神事件,更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隐喻。反映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经验”在优秀作家身上引起的精神共鸣和思想顿悟。毋庸置疑,作为当代文坛上颇有影响力的藏族作家阿来的出现,是民族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两种语言间流浪”的艺术馈赠,更是坚持本色创作、遵从艺术规律、转易多师的必然。尽管作家曾经直言:“如果一个作家把另一个作家作为终生偶像,那么他自己就不可能成为大作家……我不会只喜欢某一个大师,我也不是大师,我可能某一阶段喜欢某一类东西。”但在艺术观念、文学理想和创作实践等方面,鲁迅和阿来之间的暗合关系则是客观存

在的。对鲁迅,阿来有其特立独行的阅读体验和心灵感悟:“我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更甚于他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我认为他的‘故事新编’体现了一种对已有故事的重现观察及其独特的复述能力,这是对已有故事往无限可能的方向发展进行了一个有力的探索。”探索艺术表达的多种可能性深刻关注着苦难生存中的芸芸众生,执着于理想的追求与向往,打破既定的成规,与庸俗世界采取不合作的人生姿态,挣扎于历史与惯性间的绝大苦闷与孤独,使生逢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位智者在某些层面上获得了精神上的同构和遇合。

—

陈方竞先生在《鲁迅与浙东文化》中阐明了鲁迅与传统文化,具体与“故乡文化中的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确立了“浙东文化正是鲁迅感悟、认同并追寻远古越文化的基础。鲁迅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当年鲁迅怀揣着8元

收稿日期:2009-05-18

基金项目:大连民族学院青年基金项目“鲁迅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研究”(2007A408)

作者简介:丁 颖(1975-),辽宁大连人,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鲁迅研究;

邵洋洋(1979-),辽宁抚顺人,大连民族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学。

川资,走异路、逃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尽管一生辗转过南京、厦门、广州、上海,甚至去过域外的日本,但“还是摆脱不了往昔环境的影响”,^[22]故乡鲜美可口的瓜果菜蔬,如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等都曾是他的“思乡的蛊惑”,而且“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回顾。”^[23]在文学创作上,鲁迅的确时时以蕴涵丰富的审视目光,注目于故乡土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精神上的频频还乡昭示着作家与故乡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呐喊》诸篇大量以鲁镇、未庄为写作对象,叙事空间烫贴着故乡S城的气氛和环境。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和人情世故在作者的笔下自然舒展开来,完成了宗法制社会乡土生活的图景描绘,塑造了象阿Q、闰土、小栓、老栓、七斤、八斤等农民、苦人形象。“那种对世态人心的剖入入微、鞭辟入里的“原动力”,正来自那片古老的土地的历史深处”。^[24]《朝花夕拾》中收录的作品,大多是中年鲁迅对青少年时代的心灵书写,苏生的都是历经岁月淘洗的美丽记忆和深沉感喟,爱憎的情感更多地赋予了令他意图摆脱却终身如影相随的乡土。那被孩子们视为人生“盛事”的迎神赛会,“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无限生机又无限乐趣的“百草园”,阿长与《山海经》,长辈的赠品与《二十四孝图》,充分展现了与故乡土地深厚的亲和力以及深入肌肤的深忧隐痛。而这恰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血缘性的地缘”,可以说明,乡土作为地缘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会以隐形或显形的方式深刻地渗入到作家的血脉中,影响着作家的想象以及审视社会、看取人生的眼光。

故乡文化同样赋予藏族作家阿来强烈的写作内驱力。据有关资料介绍,他的母亲是汉族人,父亲是藏族人。1995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从地理环境上看,四川西北部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紧邻成都平原,山清水秀,草原辽阔,江河纵横,融气势磅礴、广袤宽阔、俊秀幽深于一体,以真实得近乎梦幻的姿态激发着作家的想象和创作的灵感。阿来自幼就生活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位处偏地,90%的人都是文盲,能够得到的书面文化熏陶十分有限,但口头文学很兴盛。从小就听过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那些带有神秘色彩并且被不断修正的口头文学给了阿来很多

想象。同时,阿来的童年孤独寂寞,无人问津,长期的牧羊生活使阿来目之所及皆是美丽孤寂的岩石、草地和雪山。这些都滋养着阿来表达的欲望和文学体验的敏感。作家从小就耳濡目染着丰厚的藏族民间文化资源,创作的小说深深地植根于藏族人民的社会历史生活,传达着神秘浩瀚的藏文化所带来的淳朴与执着。阿来成长的受惠因素很多,但长达30多年的藏区生活经历无疑赋予他得天独厚、罕人匹及的文化优势。而且此地是藏、羌、回、汉杂居之所,在文化观念和民族意识上,也使阿来坚持“民间写作”,充分发挥“自然天生的能力”。对于自己的作品与故乡的关系,他这样形容:“一个曾经长期浸润于自然山水中的人,与一个没有这种浸润的人肯定大不一样。但在这个人与山水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介质,那就是文化。对我来说,自然山水、一草一木,不只是环境,同时也是我的表达对象,也有丰富的含义可以开掘。自然界与作家文风之间可能存在的对应关系,我没有细想过,但这个可能是存在的。比如我自己,总体上保持一种大气与力量,但在局部处理上,又绝不流于粗疏,而是有相当精细的东西。这可能就是故地山水的影响吧。”^[25]80年代,阿来在《西藏文学》上发表的题为《阿古顿巴》的短篇小说,塑造了一个类似于维吾尔族的智者阿凡提、蒙古族的巴拉根仓一样的人物——阿古顿巴,广泛流传在西藏的阿古顿巴的故事共90余个,阿来借用这个人物的刻画,刻意表现其“不是常人看到的他智慧的一面,而是注意到看似笨拙地显示其智慧的地方”。意在在这个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再创造中,表达民众的愿望,体现着民间的话语和智慧。作家在谈论《尘埃落定》的时候有过这样一段自叙文字:“作品究竟会写多长,取决小说中的人物有意思的时间有多长,惟一想做的是在社会文明进步、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时候,寻找到一种回肠荡气的精神,在藏族民间、在怀旧的情绪中,我找到了这种精神。”^[26]在这段谈论作品创作动机的文字里,明显地看到阿来对已逝历史所蕴涵的民间精神的珍重,他还断言这种“回肠荡气”的精神就存在在“藏族民间”的生活中。

二

作为作家,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如何面对现实,如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世界的问题。作家的价值观

和自觉意识直接影响着作品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接近程度。鲁迅带着“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极大怀疑,遵从着内心的体验和对外界社会、历史的深刻感知,充分发挥独立不依的主体精神,对既定的成规和“先验”的世界采取了“否定”的审视姿态。《狂人日记》作为其白话小说的首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最具有震聋发聩效果的是对“吃人历史”的发现以及对历史真实性的彻底怀疑和全面否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94] 这里是借“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狂人之口,发出了对道德社会和礼制秩序的大胆否定和抗争。《过客》中的过客困顿倔强,目光阴沉,充满着对经验世界的厌憎和绝望,断然拒绝回到过去,因为那里“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这种体验建立在独有的对现实社会感性体验的基础之上,最终完成的是对黑暗而腐败的社会的冷静审视和批判。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收录一文《死》,在这篇为学界视为类似于鲁迅生前遗嘱的文字中,在有关亲属的那一部分,作者频繁地使用“不得”、“不要”、“倘不”、“万不可”、“万勿”等字眼,以完全否定的思考方式,写尽对世俗世界的不信任。以完全不合作的精神姿态,表达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怀疑。

在把握和审视社会的方式上,阿来坦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相对于这个社会的主流,我们可能终生都在叛逆期。”虽然阿来和鲁迅生活的环境、面对的现实压力和挑战,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相对于主流文学界和现存的思想秩序,他们共同采取了对主流社会和“绝对真理”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纷纷选择以作品代言真实的自我,以内在而非表面的方式,完成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鲁迅笔下的狂人在四面皆是敌意和杀气中,发出了“从来如此,就对吗”的深刻质疑。相对于常人世界,狂人的癫狂和语无伦次正是其绝不随俗从众、打破既定模式和成规的具体表现。同样阿来在《尘埃落定》里成功地塑造了“傻子”形象,他是作者精心设置的线索性核心人物,为麦其土司酒后与汉族太太所生的儿子,虽然“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证明小少爷是傻子”,但他超然世外,淡薄权利,不会给任何人的生存造成压力

和威胁。所以很自然地得到了除母亲之外的所有人的喜欢,包括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未来土司职位当然的继承人,他也时常流露出兄长般的慈悲和柔情。傻子生活在“习俗和历史的巨大惯性中间”,大部分时光自娱自乐,随波逐流,偶尔灵光一现,就给人以极大的惊讶和震惊,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种植罂粟还是种植粮食,傻子与其兄分守南北粮仓的方式方法,开边黠武还是开辟边境贸易,傻子的无意之举总是会不期然地得到最好的效果。“完全是因为我,和平才降临在这片土地上。傻子被赋予了命运、福气、天意等同样的意思。”^[192] 一方面通过傻子的所见、所听、所思、所感,见证了土司家族、土司制度的衰亡和走向瓦解,另一方面阿来借傻子的的心灵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碰撞,揭示所谓痴傻和智慧的现实境遇,“从最简单的地方提出最本质的最致命的问题”,而这正是阿来特有的反抗方式,赞佩傻子身上的为人始料未及的“灵光闪现”,借以讴歌为宗教、为官方话语所遗忘的民间文化的精华部分,而这正是阿来反思民族文化,反思人类文明最为深入的地方。

三

作家通过创作显现其思想达到的深度,透过人物和形象来具化他的思想,通过反抗和建构来彰显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最终指向对人性、社会性的分析和判断。

“只要心思纯白,未经过‘圣人之徒’作贱的人,也都自然而然地发现这一种天性。”^[193] 在这里鲁迅推崇的是没有经过圣经贤传教化的自然天性,推崇“野兽性”,厌憎文化对人灵魂的捆绑和抽空。在小说《故乡》中,鲁迅通过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对比塑造,传达着作者对礼教文化的反叛心态和理性反思。中年闰土的“辛苦麻木”除了“兵、匪、官、绅、多子、饥荒”等外在压力外,更多的苦楚来自于由来已久的文化束缚对其心灵的桎梏和虐杀。牢固的阶级意识和宗祠观念使他无力回到童年时代的天真无忧,甚至连回眸的余裕都没有。而在“我”的记忆中,“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统统作为那一位十一二岁少年的陪衬,闰土的“小英雄”形象生机勃勃,充满活力,通身洋溢着浓郁的乡野气息。并且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这正是鲁迅所

崇奉的“白心”和“内曜”精神辉映下的自然入性和自然人生。为此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进一步提出“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借“无常”和“女吊”等带有民间宗教气息的形象，盛赞生气淋漓的极富原朴意味的民间、乡野力量，讴歌他们的破坏意识和复仇精神。而那些饱学“圣经贤传”的所谓知识分子，因心灵的空虚和生命力的疲软而身上永远褪不掉“做戏的虚无党”的气味，他们被鲁迅命之为“伪士”，并终身不加余力地加以批判：“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17] 这表明了作家对士大夫阶层庙堂文化的深刻厌倦和犀利批判。

相对应的，阿来也充分认识到文学是以自然品格作为艺术追求的质素的。“我认为是先有感受，后有语言。这才是文学的自然。”并将文学看作宗教，作为宗教信仰来经营，声言将“用文学追求美。追求自然的美，语言的美，生命的美，以及在艺术当中才能实现而我们的生命并不能实现的美。”，“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永恒，是我自身内在的需要。当我面对尘世喧嚣、算计、烦恼、压力，我一回到文学，这些就消失了，就如跨进教堂大门或寺院，听见管风琴响起，或念经声响起，我就很自然地在那种状态中了。”《尘埃落地》力图从浮面的人生诸如权利、肉欲、暴力、杀虐之外剥离出生命的本质。傻子以自己的心灵感受世界，以自己方式建构友谊，以自己的标准遭遇爱情。驱动他思考和行动的是自然。面对土司制度的瓦解和沦亡，傻子安之若素，以自然的心态面对生命中的浮沉、起落，以顺应潮流的姿态接受既到的和将到的一切。包括在死亡面前也表现出的清明的镇定和从容，倾听着并欣赏着死亡的到来：“刀子，锋利的刀子，像一块冰，扎进了我的肚

皮。不痛，但是冰冰凉，很快，冰就开始发烫了。我听见自己的血滴滴嗒嗒地落在地板上，我听见了店主朋友哑声对我说再见。”^[18] 这种顺应生命的方式本是傻子常态人生的常态反应，以非理性的方式洞问理智社会的所谓“真理性”，调侃其奋竞和挣扎的无意义和徒劳，并以此凸显出成人世界的丑陋、贪婪、萎琐和虚伪。

作为极富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即使在病中，鲁迅也是“心事浩渺连广宇”，深谓“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同样，阿来将创作比作是传播佛音“佛经上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这里不乏对民众的关怀和深沉的感情。优秀的作家就是如此，即使在某些方面构成区隔，形成其创作的个性和思想的殊异，但在某些创作主题和创作意识面前也能贯穿起全部的人生经验，共同为民族文学的丰富性、深刻性以及超越性贡献自己的价值和智慧。

参考文献：

- [1]鲁迅.鲁迅全集·坟·杂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2]鲁迅.鲁迅全集·朝花夕拾·小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3]阿来.尘埃落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4]阿来.寻找本民族的精神[J].中国民族,2002,(6).
- [5]鲁迅.鲁迅全集·呐喊·狂人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6]鲁迅.鲁迅全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7]鲁迅.鲁迅全集·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曲晓红

A Comparison of Culture between Lu Xun and A Lai

Ding Ying, Shao Yangyang

(College of Chinese and Law,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116600,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Institute,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116600,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Lu Xun established his worthy status in literature with his "profound manifestation and special style", constructed the pattern of Chinese spirit with his "spiritual resources",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writers' cultural reflection and spiritual pursuit. The Tibetan writer Alai is not only nourished by western culture, local Tibetan resources and religious tales but also is related to the representative of Han culture— Lu Xun spiritually,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probe into the profoundability and ingenuity of A Lai's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helps to explore the writers' basic creating law during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exchang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Lu Xun; A Lai; Comparison of culture

鲁迅传统与藏族作家阿来的创作

作者: [丁颖, 邵洋洋, Ding Ying, Shao Yangyang](#)
 作者单位: [丁颖, Ding Ying \(大连民族学院, 文法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0\), 邵洋洋, Shao Yangyang \(大连民族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0\)](#)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7条)

1. [鲁迅 鲁迅全集·坟·杂记](#) 1998
2. [鲁迅 鲁迅全集·朝花夕拾·小引](#) 1998
3. [阿来 尘埃落定](#) 1998
4. [阿来 寻找本民族的精神](#) 2002(6)
5. [鲁迅 鲁迅全集·呐喊·狂人日记](#) 1998
6. [鲁迅 鲁迅全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98
7. [鲁迅 鲁迅全集·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 1998

相似文献(8条)

1. 期刊论文 [董正宇 一个傻子眼中的“尘埃”世界——试析阿来的《尘埃落定》](#) -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23(1)

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从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角度，冷眼观察纷纷扰扰的“尘埃”世界，反映了作者阿来独特的历史感受和生命体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傻子”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一种继承与深化的关系，两者都是20世纪中国人现代化心路历程的曲折表现。《尘埃落定》的成功，是当代中国文坛又一次重归传统的努力和尝试。

2. 期刊论文 [倪淡水, NI Nong-shui “亚现代性文学”: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智性选择](#) -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 26(3)

在现代性文学和传统性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亚现代性文学”,即“中国民族性与世界现代性结合的文学”。它体现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有意进行中西方文学结合的创作实践;由林语堂所开启,张爱玲、王安忆等人所继承发扬的现代都市文学;以周作人、余秋雨等为代表的文化性文学和以萧红、郁达夫及后期余华、阿来等当代作家为代表的个性化文学这样四个方面。“亚现代性文学”是中国新文学自身发展的智性选择,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的价值观和读者的审美诉求,具有独特的美学品质。

3. 学位论文 [左文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 2003

文学是人类言说苦难的诗学方式,宗教是苦难世界的人们幻想幸福的意识形态。对苦难的共同关注是佛教文化价值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首要契合点。在随缘中承担苦难、在还灭消解苦难、在度化中救赎苦难这三种佛教应对苦难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阐释佛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文章以佛教“三法印”、“四圣谛”及禅宗理论为宗教理论背景,来论述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同时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带有佛教色彩的如鲁迅、沈从文、丰子恺、废名、许地山、施蛰存、李叔同、苏曼殊、徐志摩、汪曾祺、史铁生、马原、余华、阿来、阎真等作家及其作品的个案分析和系统梳理来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对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在价值观上的选择、亲近与背离,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论述中,文章认为,因为对苦难及应对苦难的方式的共同关注,佛教获得了现实层面的可行性和终极层面的永恒性,20世纪中国文学因此获得了一种可贵的人本主义品质。菩提之花与缪斯之光必将在未来继续照亮人们远离人生苦难、重返精神家园的漫漫旅程。

4. 期刊论文 [宋洁, 赵学勇, SONG Jie, ZHAO Xue-yong 当代文学中的非常态视角叙事研究——以《尘埃落定》、《秦腔》、《我的丁一之旅》为个案](#) -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

世纪之交,当代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三位作家不谋而合地选择了非常态视角叙事,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贾平凹《秦腔》中的疯子引生,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中的行魂,这一叙事视角的选取既是对源自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传统的承续,也是对西方、拉美等文学现代表现技巧的借鉴,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叙述面临困境时的创新努力。这种努力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它既是对新时期以来小说形式探索的深化,也显示出从内容探索向形式探索转移的某种内在需求及其对二者关系的重新审视。

5. 期刊论文 [太扎姆 试比较《狂人日记》和《尘埃落定》两部作品的创作](#) -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11(2)

鲁迅的《狂人日记》在现代文学史上开白话文之先河,阿来的《尘埃落定》则在当今文坛掀起西部文学的一个高潮。本文从主题切入方式、作家语言风格、作品优势土壤、艺术手法选择等方面对两部作品的创作加以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以进一步认识和解读作品和作家。

6. 期刊论文 [聂鑫森 说一说阿成](#) - [时代文学](#) 2001(2)

很多年前,我和阿成缘桴一面,只读过他的小说。但这个“阿”字,却使我浮想联翩,我固执地认为他大概是出生于上海的,因为上海人喜欢在姓名中使用这个很温柔的字眼。比如我在工厂当工人时,我的师傅王二郎,又名阿义,就是个地道的上海人。后来又猜测他是少数民族,因为藏族作家阿来的名字,可以佐证。直到在北京读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时,我的同窗好友孙少山说:“扯蛋!阿成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以前是大车司机哩!”他还不无嫉妒地说:“这小子不独小说写得好,人也长得英俊漂亮,有块有方,称得上堂堂一表,凛凛一躯。”

7. 期刊论文 [闫静 傻子世界对人生状态的悲情呼唤——以《爸爸》和《雾月牛栏》为例探索傻子形象的审美价值](#)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作家塑造了“傻痴”人物形象。如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以其癫狂的疯子状态反对集权专制社会的战斗精神;阿来的《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则演绎了藏族土司制度的兴衰历史并寄托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思考;韩少功的《爸爸爸》以一典型的傻子“丙崽”形象呼唤着文化的“寻根”;迟子建《雾月牛栏》中对宝坠傻子形象的精心构造,挖掘了某些人群内心的痛苦和对人类至善至美的境界的追求。本文将分别从《爸爸爸》和《雾月牛栏》两篇作品来进行解析傻子形象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

8. 学位论文 吕豪爽 文化超越与审美创新——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精品论 2007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古至今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坛纷繁多样的新时期亦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黄金期,尤其是小说体裁已经呈现出由边缘向前沿挺进的趋势。与创作领域兴起的波澜不甚协调的是相应的评论与研究的相对沉寂。在本土文化和边缘文化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今天,将目光聚焦于与少数民族文化脐带相连的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已成自然之势。选取获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在国内乃至国际平台上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少数民族小说的精品之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以期在此基础上收获更具代表力度和研究价值的结论。借助兼顾文化指向与美学质素的文化诗学的批评理论透视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以期择取更能契合研究对象本质,更能显现研究对象光彩的方式切入。于此视角下,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选择成就了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的凸显。他们以开放的心态超越一族、一己之界达至多元与终极,在文学永恒之命题上阐释表达母族意念,在多方文化之兼容整合中进行艺术创新。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由此得以与他者文学样态平等对话且又特异卓立。

本文以对大量小说文本的细读阐释为基础,运用文学—文化批评模式,紧紧围绕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进行融合宗教、哲学、民族学、人类学视野在内的文化与美学的双重考察:

导论部分,首先对研究对象的选择进行了界定和说明;其次就即将运用的核心理论,即文化诗学阐明了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再次,交待了考察和行文的内在逻辑和理路;最后,对论述的目的及可能产生的意义予以简单陈述。

第一章重在从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的创作主体,即少数民族作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选择考察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呈现的多元的精神指向和多元的文学景观。依据作品显现的创作之时文化资源的接纳索取与文化身份的认同建构情况,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姿态大致归纳为五种类型:“栖息于多种文化的精神崇尚者”张承志之外,以石舒清为代表的“执着于一方水土的故乡守望者”与以阿来为代表的“汇通于世界潮流的人性表达者”均秉持族别写作,前者以对故土的坚守抵达对母族、对文学纯粹性的坚守,后者在远离故乡的地方行进而于写作构筑的怀乡之路,在对民族精神的张扬中追求普遍性寓意的表达。以霍达为代表的“追随于现实境况的民族思索者”和以鬼子为代表的“致力于经验传达的个人书写者”均淡化或回避民族身份,前者以反映中国现状为己任,后者在自我表述的捍卫中以思想与形式的先锋征服人心。

第二章以少数民族文化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主题话语的影响为切入点,探究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在对一些聚焦主题言说时显现的内蕴、规律、特征和范式,挖掘这些特征、范式与少数民族生存境遇、宗教信仰等民族文化因子之间存在的深层关联,揭示少数民族小说与其它样态的小说在勾勒这些主题时显示的差异。“遭遇”主题、“自然”主题、“死亡”主题是此章选取和论述的重心。

第三章旨在探讨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于多元文化借鉴融合之上的艺术创新。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在整体上摆脱了狭窄的艺术思维空间和艺术创作视野,多在通晓汉语及汉语文学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大胆借鉴和移植中西优秀的文学叙事传统和艺术表现手法,并努力将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人文品质和认知思维方式融汇其中,彰显于外。本章主要从语言、意象、形象、叙事四个层面,以对典型个案的深入剖析完成论证。

第四章一方面开掘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作为文学文本本身所内蕴的文化价值和形成的美学价值,一方面将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映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策略与文化智慧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从“边缘与中心的辩证”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互动”上发现其对中国文学及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未来走向所具有的参照意义和启示意义。本章所进行的对研究对象的价值评判与定位也进一步间接地提升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结语部分对全文予以总结,对相关问题予以补充阐释。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文化诗学理论引入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领域,以对典型作家作品的解读第一次尝试完成了对新时期阶段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中小说体裁创作的整体宏观研究,其间对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文化姿态做出的类型划分与描述,以文学主题范畴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进行研究的思路和实践等,均体现一定的开创意义,不足之处在于所涉作品涵盖面还相对偏狭,开掘探讨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的艺术贡献之时创新意识还相对欠缺。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6016.aspx

授权使用: 黄山学院学报(qkhsxy), 授权号: 8916a8f0-6907-44b4-9173-9eb90104639f

下载时间: 2011年4月2日